

文化传统与

中国文学理论

的现代历程

庄锡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文化传统与

中国文学理论

的现代历程



庄锡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历程/庄锡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

ISBN 978-7-5426-3008-7

I.文… II.庄… III.①文化传统—影响—文学理论—中国—现代②文化传统—影响—文学理论—中国—当代 IV.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734 号

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历程

编 者 / 庄锡华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4.5

ISBN 978-7-5426-3008-7/C·301

定价:45.00 元

目 录

导论:文化传统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观	1
文论史研究现有格局的思考	1
传统文化在现代文论中的绵延	5
战争动乱中的学术建构	12
审美观念的缺失与回归	20
文论史的反思与学术规范思考	25
五四新文学的文化之根与学理反思	27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渊源	27
胡适文学思想的矛盾与文化蕴涵	46
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化	67
激进主义思潮与左翼政治化文论	84
动荡时代的激进主义思潮	84
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观点及影响	93
左翼文论的兴起与文化解码	113
鲁迅的文化立场与审美意识	128
胡风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149
毛泽东文学思想的社会取向	171

多元文化背景与自由派文论	188
边缘化生活中文化追求	188
学衡派的不平之鸣	196
常态人性与梁实秋的文学思想	209
闻一多与非常时代的审美自觉	229
沈从文创作与文学思想的文化底蕴	246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文学思维的成形过程	266
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的新觉醒	267
厚今薄古与遗产继承	280
文学启蒙意识的回归	289
文学认识价值的肯定及其纠偏意向	315
周扬的文学思想及新时期的发展	339
思维方式的自律与文学学术规范的建构	361
中国式思维方式两面观	362
学术无私与学术史书写的周延性	366
文艺学研究的两个维度	373
结语：传统，未完的叙述	377
后记	388

导论：文化传统与 20 世纪 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观

文论史研究现有格局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后,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整体审视与系统总结的需要益显迫切,反思百年文论的发展历程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研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总体来说,已有研究注意到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受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却较少看到中国现当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重视革命文学的主潮地位,但对中国文论数千年来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格局在现当代得以延续的事实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非主流文论缺少深入分析与客观评价;注意到 20 世纪学术政治化趋向,却没能对这一趋势的文化渊源与现实背景做出恰当的解释。“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①谨记先哲们在学术研究中积累下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现当代独特文化背景切入,体察这一文化生态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同的学术立场结合后形成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相应的学术形态,通过对那些在现当代文学思潮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和代表性人物思想的描述与解剖,从多个维面梳理文学学术史的走向,构建现当代文学理论具有张力的整体观,总结经验教训,为 21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思想材料与理论支持,遂成为笔者一个非常强烈的心愿。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 页。

叶以来,除因承担一个有关马列文论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之外,我一直在耕耘这片田地,期望有属于自己的新的创获。作者将本书看作是自己 20 余年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努力达致对文学史发展的整体把握,是我对现有文学史写作与时代需要的一种反应。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重写的要求日趋强烈,其间发生了两个引人瞩目的事态发展:一是长期被埋没、遭轻视的非左翼作家的创作与文学思想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一是对左翼文艺的认识也趋向客观,对其复杂的存在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我觉得现有文学史写作尚未完全从以左翼文学为主体的思路中解放出来,未能将改革开放后的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文学史新的写作,对某些文学史事件的看法仍然以文学史上个别重量级人物的意见为依归。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在这里先入之见、随心所欲,仍然极为普遍地存在。例如,对同一个研究对象鲁迅的文化立场,就有“反传统”与“复古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某些鲁迅研究庶几成了人们认识鲁迅的障碍。对鲁迅研究的考察,使我深深地意识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拿鲁迅研究来说吧,鲁迅在世时他的创作与思想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囿于论者的立场,毁誉荣辱之论往往而有。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成了“显学”,论著汗牛充栋,众口铄金,鲁迅被日益神化。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人们追捧的是一个全智全能型的鲁迅,一个超人的鲁迅,关注的是思想家的鲁迅,而不是文学家的鲁迅,人的鲁迅。给人们正确认识鲁迅设置障碍的研究俯拾即是。不过今天的认识障碍已经不是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束缚,而是学术人士的人为因素。诚然,每一个涉猎其间的学人都有拓展创新的欲求,但人们不能因此片面地将学术创新等同于缺乏根据的标新立异,制造许多认识误区。我认为,学术自由不应该成为一部分人随意发表意见的托词。

此外,学术界虽然开始关注左翼文艺之外的文学思想、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研究尚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今人可以用武的地方仍很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文学理论界曾展开过许多争论,文学史书写者对左翼立场的坚守影响到其对非左翼文论的客观评

价,对那些在学术研究中努力求知、欲有所为的学术人士虽然不再全盘抹黑,但研究平面化的状况仍然未能得到根本的改观。在这样的书写格局中,文学史建构似乎未能达成客观性、完整性的目标。拿梁实秋文学思想的研究来说吧,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对他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独辟蹊径的文论有了较多正面的评价。然而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其实有两个来源,他的人性二元的区分除受白氏的影响外也与宋代张载的人性观相契合。梁实秋强调文学情感表达质的纯正与量的有度,不正是孔子所谓“温柔敦厚”的审美追求吗?梁实秋与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界在关于文学阶级性问题上有过不乏意气的争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梁实秋立足生活、立足现实的基本秉持,他在这方面的有些意见甚至可以视之为左翼文论的同调。必须看到,新文学发展虽然处在一个动乱、战争的社会环境中,但它仍然不失为丰富与多样。左翼之外的文学家、文论家也一样认真创作,并在文学学术的研究与阐发中贡献了自己的才智,表达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时移境迁,今天看来,这部分文论家中的较杰出者因为较少受到时势、党派、政治立场等外部因素的拘囿,注意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厚营养,展示出八面来风、任情采撷的特点。文学史的写作缺失了对这部分人研究成果的关注是不完整的,文学史写作因固守成见在对这部分人的描述中缺失公正也必是片面的。

基于构建完整的文论史论述框架的愿望,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思想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早期共产党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主导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型,研究表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型是有内外部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研究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思想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革命文学兴起的必然性。此外,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清理,还让我看到了早期共产党人文学思想的复杂性,李大钊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新文学建构目标及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的主张引发了我对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发展许多新的想法。

毛泽东文学思想也应在本书的论述框架中加以观照。这里的着重点是揭示毛泽东工农兵文学方向的人学意涵及毛泽东浪漫主义文

学观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总体而言,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形成了激进主义为主导,由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分天下的文化格局。激进主义在五四时期已是强势的思想意识,否定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便是其表征。激进主义后来更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精神支柱。部分左翼文艺家提出了不少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左的口号,在力量对比不利于革命的方面,自己亟需援军的时刻没能认真地去团结同情革命倾向进步的作家,不是着力于对创作进行审美的锻炼,提高其创作的艺术欣赏价值,而是简单地将标语、口号装进他们所谓的创作,以期达到宣传的目的,有人还在他们的文论中散布革命恐怖主义。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激进主义仍然保持了强势。在文学审美领域,虚假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相互配合,在创作中宣扬盲目的乐观情绪,仅凭主观意愿塑造脱离现实的英雄人物;在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上,他们举着“厚今薄古”的旗帜全面否定文化传统,鼓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坠入了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保守主义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拨,但它罔顾时代潮流,身处发生激变的时代却要固守成法、蹈袭旧路,先天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不足以构成对激进主义的挑战。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潮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帮凶,对其独立品质的研究长期付之阙如。自由主义思潮流贯于中国现当代。五四时期以胡适为首的学人群是这一思潮的体现者,他们洁身自好,有意扮演社会正义的主持者的角色。“学衡派”态度比较激烈,但其文化立场却具有中间特征,表现出浓烈的自由派色彩。学衡派受新式学理的熏陶,在现代学术规范的建构上表达了不少独到的见解。20世纪30年代的“人权思潮”也是自由派掀起的波澜,新月派是这一时期自由派的中坚力量,新月派中梁实秋、闻一多关注文学的审美功能,显示了与左翼文艺界不同的学术兴趣,他们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值得关注。如前所述,梁实秋二元人性论的文学观既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也与宋儒关于气质人性与义理人性的划分相契合;他反对毫无节制的浪漫倾向,既满足

了新人文主义关于纪律与规训的倡导，也与传统文论以理节情的价值取向一致。40年代沈从文不合时宜地从沉潜书斋的自由派“观念人物”跃跃欲试地走向社会前台，发表文章、参与论辩，成为该时期自由派中引人瞩目的“行动人物”，但沈从文以传统文化作为坚实底蕴的审美追求与他在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

有鉴于此，本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观察将引入两个重要的维度，即文化传统与战争动乱的现实背景。我将其视为实现对现当代文学思想发展整体掌握的两个关键点。前者是解决学术史写作完整性的理论基点，后者为解释中国现当代学术政治化取向提供了合适的思维切入点。

传统文化在现代文论中的绵延

一般认为，新文化是在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发生、发展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新的学说的兴起，总是以激烈的批判为先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是事实，五四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对文化传统兼收并蓄，便谈不上对一个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民族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因为这个被全盘继承的文化其实包含了太多的惰性，无法促成该民族跟上时代潮流，融入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民主与科学、批判文化传统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新文学的发展并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而“全盘西化”，这也是一个显明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开始克服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单面思维，不断切换透视的视角，以探究文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而文艺理论界也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虽然实现了具有质变性质的话语转换，但仍然带着其脱胎而来的民族文化的一些重要特性，现代文论并非无根的学术、纯然舶来的学术；而传统文论也并没有“失语”。我认为，既然古人与我们是对同一个人类生命现象进行观察、发表意见，那么，认识必有相通，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只是因为话语转换，表达的方式

有所不同罢了。

我认为,断裂论之所以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是因为断裂论忽略了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但一些基本精神与基本概念间却存在着或显或隐的联系。譬如,左翼文论表现出极强的务实特性,文论家社会责任担当的意识高涨,他们的文论反复强调文学应当关照当下,文学家的创作是参与社会变革的武器。这一思想取向,我们分明能从封建时代欲有所为的士人及其文论中发现。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抬升至“经国大业”的高度,对后世文人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王逸《楚辞章句序》对志士精神予以热烈的褒扬,说:“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称颂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屈原这种忧国忧民、奋不顾身的精神极大地鼓舞、影响了后世士子,使他们时时以天下自任,每临大义决不惮于前驱。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深受古人精神的感召,在目睹了故国的陆沉后觉醒、奋起,坚决地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楚辞章句序》还对“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的创作立意给予明确的肯定,而这样的审美追求也因此相沿成习,成了那些“进也忧,退也忧”的士子寄意篇籍的基本秉持。在叶燮《原诗》中,它被归结为“风人之旨”,叶燮赞扬杜甫:“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白居易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目的极为明确,并认定,诗歌文章“可以救济时病,裨补时阙”。在《新乐府序》中,他更将著作宗旨明定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坚决摒弃纯个人的“为文而作”。新文学运动继轨接武,突显了新派文人政治化的人格特征。陈独秀将欲新政治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目的,左翼文论更直白地将文学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审美立场与政治立场结合紧密遂成为中国文论前后一贯的传统。

总体而言，传统文人选择著书的背后，总是可以发现兼济的自觉，刘勰、严羽、叶燮这些人，大多是救世不成而选择了救诗救文，由救诗而救世，实现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沧浪诗话》将江西派、江湖派视为诗歌健康发展的大敌，挥笔上阵，文字中浸透了诗论者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气。严羽胸怀大志，却生不逢时，当时的南宋，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时势已不能给严羽提供施展人生抱负的舞台。当严羽明白了入仕之路不通之后，并未表露出任何“不才明主弃”、“当路谁相假”的自怨自艾。他在科举之外，寻找施展平生抱负，救世济时的生活道路。将自己的家国之恋，转向了“诗而至此，可谓一厄”的病态的诗坛，积极承担起校正诗坛弊病的历史任务。严羽的这种论诗态度、论诗风格，大大改变了诗话的旧观，使后世论诗者不再能视诗话为聊遣余兴的率性而为。诗话因此充满了论诗者昂扬亢奋的理论自觉。特别是严羽以布衣之身而与诗话结缘，由诗话而得名垂后世，极大地刺激了后来论诗者，使之以更大的投入，寻找别样的人生辉煌。清人叶燮亦复如是。叶燮于中年之后始得功名，然而居官没几年，便因“细故”落职，失却了于仕途行兼济的人生机遇。这对于躬行儒家学说的叶燮来说，这遭际确实是悲剧性的。所幸的是叶燮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本来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仕宦前途也并不抱什么幻想，于是，一朝罢官，便浩歌归去，对世俗的侵袭，回以耿介的冷眼，索性特立独行，在诗学领域内，大行其兼济之道。

中国现代新文学注重启蒙精神与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谓之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胡风、邵荃麟这些人承五四之余绪，始终关注国民精神的审美改造。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不少发起者最初是相信科学救国的，但面对麻木的国民，终于意识到，比诸引进现代科技，唤起国人的自觉、完成思想的启蒙的任务更迫切、更重要，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赋予文学以启蒙的重任。这与传统文论注重文学的教化作用非常相似。中国古代，风是诗（民歌）的别称，“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者，教也，风又与教同义。儒家文学观重视诗教，认

定文学审美可以“化性起伪”，教人向善，抑制社会矛盾、使其不致激化，以维持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左翼革命文学虽然是要打破现有社会秩序，但它也需要借助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实现政治动员。因此，总体上看，无论是传统文论还是现代文论，在文学审美问题上均表现出浓浓的工具意识。

此外，中国现当代文坛虽然充斥了虚假浪漫主义，但左翼文论却始终将真实性当作核心概念加以阐发。胡风、冯雪峰这些人，将大量心力用之于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阐发，用心良苦。而在传统文论中，人们也将文学看作是采风、了解民情、风俗的重要渠道，自然也十分重视文学表现的真实性。叶燮是以“触物兴起”、“克肖自然”来表述他的诗歌发生论的。不过，传统文论的相关论述更符合文学审美的实际、更具有学理张力。我们知道，在表意与写实上，文学更倾向于表意，传统文论对文学的真实性的认识侧重于抒情言志的方面，而左翼文论的真实性原则执拗地固守反映论的文学界面，强调写实，要求文学反映达到规律与本质的程度。

因此，进一步说，甚至新文论的某些缺失也可以从传统文论那里寻找到源头，譬如功利意识的问题。中国儒家文论的政治化取向是众所周知的，其文学具有极强的功利意识，不重视文学审美的超越品格。左翼文论生成于一个动乱的时代，更将文化政治化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很少有关于审美的注意。

现代文论对于文论传统的传承关系与中国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个多元共生的基本格局也不无关系。李天道在《中国美学之雅俗精神》一书中指出：“构成中国美学思想体系主流的是儒、道、释三家”。他并对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的异同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同的方面看，三家“最终都归于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和雅’之境”。从异的方面看，“儒家偏重于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偏重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佛教禅宗则偏重于追求人与自我的和谐。”^①

① 李天道：《中国美学之雅俗精神》第24页，中华书局2004年。

他还认为，中国人生美学以“礼义”节“情”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和雅”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并突出地表现在人生境界论上。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是以人生论为其确立思想体系的要旨，是以传统哲学中的人学为其理论基础，儒、道、释概莫能外。可以说，儒、道、释都很重视心灵问题，都建立了各自的心灵哲学。它们都是从“存在”的意义上解释心的，认为心是一种精神存在，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结合体，境界就是心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态。并且，从重视人生出发，他们都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社会与自然，无论是“孔颜乐处”、“曾点气象”，还是“见素抱朴”、“乘物以游心”、“清贫自乐”、“随缘任远”，都表现出一种珍惜生命、体味生命的审美意趣，其最高人生境界（审美境界）则都是心灵的超越和升华。从儒、道、释所追求的人生与审美境界来看，他们都以天人合一的“和雅”之境为最高目的。^①也就是说，在李天道看来，一方面，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并存的，另一方面，儒释道三家的文学思想在关注人的存在和人性关怀方面又有共通性。

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常常显现为杂糅、互渗的现象，共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施加影响。唐代韩愈排佛，但赞成的人不多；柳宗元则主张三教并存，宋代王安石继承柳宗元调和佛老儒道的意见，以儒为主，融合佛老。王安石认为佛理并非全然地消极，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王安石认为佛之慈悲即儒之性善与仁义，佛老之“不伐似仁，无求似义”，其“超然高超”的高尚行为，与俗儒俗吏“夸漫盗夺”贪位求禄以扰民害政的无耻行径相比较，不知要高明多少！^②今人严北溟也注意到三家融合的取向，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术虽尊，而‘罢黜百家’的建议人董仲舒本人却是杂采阴阳五行诸说以附益和歪曲孔子的第一人。此外，从西汉继承老子无为思想的黄老之学到汉末作为农民起义的旗帜的道教，以至东晋葛洪创立的神仙道教，则又离老子远甚；而汉以后外来的佛教思想的广泛流行，魏晋玄风的煽扬与玄佛合流的结

① 李天道：《中国美学之雅俗精神》，第24—25页。

② 《唐宋八大家书系·王安石卷》第24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局,以至南北朝、隋唐佛教的臻于鼎盛,儒、道反佛固从未一日停止过,而一面激烈斗争,一面又相互融化,浸假而三教合一……”^①严氏还认为,“‘中西’‘古今’之争实即关于传统文化怎样和西方文化结合的深刻反思……以哲学思想为前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开放型而非封闭体,它善于批判地融化吸收各派思想……”^②像这样对中国文化发展别有心得的体会自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笔者认为,现代中国虽然经历了激烈的世变,但入世与出世、独善与普济、积极与消极、乐观与悲观的文化立场都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影响了现当代中国文论。自陈独秀开始,中国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时常激烈地否定封建载道文学,但他们对于文学作为思想载体的功能一样表达了高度的重视,努力将文学纳入思想启蒙工具范畴的心路了然可见。秉持儒家先哲的入世精神,他们以加倍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艰难时世中的审美实践。自清初顾炎武激烈排击士大夫侈谈“危微精一”的学问和专注于“言心言性”的抽象学理以来,中国的学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彰显了务实品格。处于战争动乱中的现代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阐发则更多地包含了对社会民生的关切,而他们在理论上的缺失竟也同秉持入世精神的理论前辈一样,较少顾及人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在有关文学的论述中无暇或不太愿意容纳文学悦情适意的情趣意涵。在文学论争中,他们固执己见,理屈词穷后对引入非学术超思维力量以制裁歧义人士的传统做法也颇为钟情。总体而言,我认为,功利意识、工具理性是当时文论界的主流,这是一个酝酿着大变动的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也必影响到非主流的文论。在现代文学思潮中左翼文艺界曾经与左翼以外的文学家发生过许多激烈的学术争论,然而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这些不乏意气的争论中,受到左翼文艺界激烈的排异反应的人也都没有或者无意与文艺为人生的文学主旨争锋、挑战左翼文论的这一核心观点。周作人对此说得最实在,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他指出:“我们称述人生的文学,自己也

① 《中国哲学三百题》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同上。

以为是从学理上立论的，但事实也许还有下意识的作用，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①1935年周作人写“五十自寿诗”，情绪消极备受诟病，但鲁迅认为诗里其实也还有对时势不落痕迹的讽喻。被鲁迅指责为“看客”的林语堂，虽然其文学主张与“为人生而艺术”的人观念相左，“不主张唯有宣传主义的文学，才是文学”，但他也公开承认，“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是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②周、林学佛学禅，意在高蹈，但都没能走到否认文学与人生的联系这一步。与左翼文艺界关于文学阶级性问题展开过激烈论争的梁实秋虽然执意捍卫文学的审美特性，但也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他对儒家文论的学术地位评价不高，但其文论的立意却完全轨合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旨趣。

当然，非主流文论的样态也是十分驳杂的，在我看来，真正“死抱着文艺不放”的不是与左翼作家展开激烈争论的自由人、第三种人，而是对那些意气用事的论争不感兴趣，默默在文艺园地中埋头耕耘的人。激进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学审美传统的漠视，似乎更激发了他们捍卫文学的生命——审美特性的热情，在表达他们的文学主张时，他们坚持维护个人的审美兴趣和艺术至上的观点，给这一时期略显单调的创作园地留下了辛勤劳作的身影和充满人生情趣，凌空蹈虚，独抒性灵的诗心文字。例如上文讲到的周作人，虽然他认为中国的文学难以逾越为人生的框范，但他也非常重视文学的超越性品格——贵族精神，他在讲述其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意识的理据时，虽然只谈到了西人尼采，但学识丰厚的周作人当然明白该观点也与庄子对审美的理解相通。庄子那种不是蝴蝶不是庄生、既是蝴蝶既是庄生的体验，无疑属于超越性的审美感受。只有摆脱了现实的束缚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而文学审美正是帮助人们获得超越性感受的生命活动。我们注意到，同是自由派新月中人，梁实秋的文学思想表现得更多的是用世的

① 《新文学的要求》，《周作人批评文集》第17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

② 《做文与做人》，《论语》第57期，1935年1月。

执着,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而闻一多则更倾心于从审美中获得超越性的感受。总起来看,强调文学的超越性品格的观点在战争动乱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也是一目了然的。当然,在这些醉心文学的人中也有因切断了与时代的联系失去了政治良知与民族良心的,有心独善但结果却反而作恶,与敌为友,沦为政治生活中的糊涂虫。时代总是会为生活活动于那一时期的人们大致确定一个表演的舞台。但从学术层面看,各种学术取向的存在,却也证明了艰难的时世并未割断华夏文化的血脉在文艺学美学领域内的传承。而这些热心于文学审美的作家也以其包含浓浓的审美意识的创作为文学史留下了值得称道的作品。

显然,各派文论都有自己的学术传承,他们在前台“说法”,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说了那么多让人感受深刻的道理,足以体现他们各自“渊源有自”的学问。鲁迅早年师从浙东名儒寿镜吾先生读诗诵经,以后虽然东渡日本,“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但也不能忘情旧学,身在异国,仍然刻意从并不宽裕的留学生生活费中挤出银钱去听章太炎先生讲学。太炎先生推崇魏晋士风,敢于在强权面前率性地表现自己不与世俗合流的狂狷,而他的学生鲁迅的作派与文章似乎也有魏晋人的机智与犀利。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清扫门户、全盘西化的旗号,但鉴之实际,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哪一个不是长期浸润国学,学养深厚的学者?

战争动乱中的学术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学术历程:它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艰难演进过程中的学术、人民大众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进程中的学术,也是越出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论的窠臼在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内出现了暂时的困惑的学术。概言之,战争动乱构成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背景,并提供了求解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许多学术难点的锁钥,脱离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背景,便无法理解20世纪中国文论的特征形态及其价值取向。纵览20